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论坛

通 讯

第 8 期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委员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目 录

- 一、授予杜润生同志“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特别贡献奖致敬词
.....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委会 (1)
- 二、给叶谦吉老教授 103 岁生日的贺信.....何康等 (3)
- 三、发展清洁农业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必然选择.....宋树友 (4)
- 四、母爱比海深.....刘锡庚 (7)
- 五、蒋匪猖狂攻延安 夫妻失散重团圆.....刘锡庚 (14)
- 六、建设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之路.....贺庆棠 (16)
- 七、村庄经济组织形式演化的历史经验.....郭书田 (19)
- 八、灰谐论——人体系统科学新思维.....孙万鹏 (23)
- 九、透视我国粮食八年连续丰收后的五大隐忧.....王晓明 杨三军 (34)
- 十、《农业与工业化》：农机化理论宝库.....张蓝水 (38)

授予杜润生同志“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特别贡献奖

致敬词

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编者按

2012年7月18日是杜润生同志100岁生日，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授予杜润生同志“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同志宣读了致敬词，引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被称为“伟大的先行者”，“常青树”，“智慧老人”；被称为“经济学家”，“思想家”和“精神导师”；被称为“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灵魂”……然而，他自己却说，他只是“农口的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理论的符号——

30年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对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性经济理论，杜老以及他领导的团队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杜老被公认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从1982年起，身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老，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工作的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概念，对推动中国农村变革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个“符号”，是为农民谋发展团队的符号——

30年前，杜老是农口这个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30年来，杜老始终是这

个团队的灵魂和象征。他象征着“爱人民就要爱农民”的情怀；象征着不同年龄、不同职级、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在为农民服务的大舞台上优势互补“出成果出人才”的追求；象征着面对以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特征的中国农村情况，“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传统；象征着朴实与清廉……于是，在杜老离职22年后的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机构到研究单位，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一批批在事业上、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在终极关怀上都受惠于杜老的人们，把“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这个“符号”，是科学决策、寻找共识方法论的符号——

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推进的，是广大农民的创造、是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与引导、是最高决策者的决心与明智，也是杜老团队在穿针引线中提供的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方法：研究问题“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先改革后承认，先个案后文件，“经验先于理论”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的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的方法……等等，等等，杜老的方法论不仅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中，而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

这个“符号”，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记录的符号——

30年来，杜老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英文版）、《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扩》（日文版）、《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日文版）、《杜润生改革论文集》、《杜润生文集（1980—2008）》等9部著作，两百多万字。这些文字，无疑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制度变革的重要史料，但它们首先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重大成果记录！

公元2012，今年，杜老虚岁一百。我们，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特别贡献奖授予杜老，谨此表达：

向我们敬爱的杜润生老人致敬！

向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致敬！

向伟大的中国农民致敬！

给叶谦吉老教授 103 岁生日的贺信

编者按

6月25日是叶谦吉老教授103岁生日，当叶老学生于法稳研究员在庆贺会上宣读了这封贺信后，叶老十分高兴，表示还要根据气候变化的新情况继续撰写三篇有关“人类纪”的文章，令人十分感动和敬佩。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概念是叶老早在1982年著《生态农业——农业的未来》中提出的。1987年4月23日的《中国环境报》发表了《叶谦吉教授呼吁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专访。但是《光明日报》于2010年和2011年发表文章竟说生态文明最早是1984年苏联学者提出的，1987年中国学者叶谦吉引入国内，造成混乱，被澳大利亚一位学者予以纠正。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详见《生态经济通讯》2012年第6期刊载方时姣写的《生态文明概念及其理论渊源探究》）

尊敬的叶老：

值此您老103岁的喜庆日子，我们向您老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您老长期以来在生态文明——生态经济——生态农业——生态安全的理论创新和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与发挥的奠基作用，永远会铭记在农业战线人民的心目中，在中国农业发展史籍中必将留下不朽的篇章。

您老深重厚实的爱国情怀，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永远是我们农业科技界特别是年青一代学子学习的榜样。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建设生态文明，是治国理念的重大转折，并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与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为此而高兴。但是长期以来以牺牲资源与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尚未得到总体解决，特别是农业面临污染已成为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变质的主要源头，令人堪忧。这也是您老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

为实现生态文明，国务院原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研究与促进工作，经过艰辛的努力，在2011年11月3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亲自任总顾问，积极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正在组织一批专家编著一部题为《拯救地球生物圈——论人类文明型》巨著，亲自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初稿已经写出，正在征求意见修改中。不久即将出版发行。相信您老听了这个消息会感到欣慰。

敬祝您老保重健康，生活愉快，全家幸福！

何 康 农业部原部长

石 山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郭书田 农业部原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

发展清洁农业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必然选择

宋树友

一、清洁农业的提出

清洁农业的提出，是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压力，总结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正式提出了清洁生产的概念，制定了《清洁生产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清洁生产。199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五届国际清洁生产高级研讨会上通过了《国际清洁生产宣言》，对开展清洁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1993年提出并推行清洁生产，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将清洁生产列为重要内容。1997年国家环保局颁布了《关于推行清洁生产的若干意见》。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确立了推行清洁生产的法律地位。实行清洁生产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也是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开发和利用清洁技术，把污染控制由末端治理上升为生产全过程控制，实行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有效管理，是清洁生产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清洁农业的概念。清洁农业是清洁生产在整个农业产业体系中的应用，不仅要求在田间实施清洁生产操作规程，还要求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清洁操作，清洁农业是合理利用资源并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用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措施的综合体系，最终实现农产品清洁化供给。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为了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经过对全球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农业发展模式的研究，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在2003年10月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主办的“亚太地区绿色食品与有机农业市场通道建设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绿色农业的概念，得到了与会代表和亚太经社理事会官员的赞同。绿色农业是指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工业装备和先进管理理念，以促进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倡导农产品标准化为手段，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重视，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农业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的意见》，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确立了法律地位。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成立了有关机构，明确了各级监管机构的职责。并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和“有机食品”制定了标准。“无公害农产品”允许生产过程中限量、限品种、限时间地使用人工合成的安全化学农药、兽药、肥料、饲料添加剂等，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绿色食品”的标准范围从允许限量使用化学合成生产资料到较为严格地要求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和其他有害于环境及健康的物质。“有机食品”是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的标准生产加工的，生产加工过程中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人工合成物质。

三、发展清洁农业的主要对策措施。

（一）严格控制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农业投入品的有害成分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源，主要是通过施肥、用药等生产活动导入到农业生产系统，最终危害农产品质量。因此要严格控制农业投入品质量。一是在施肥方面注重使用无公害环保化肥、复合肥和有机肥，同时针对有机肥质量难以控制等问题，严格执行有机肥产品质量行业标准，并确立严格的产品登记和质量检测制度。大力发展和施用无污染的微生物肥料，以提高农作物品质，减少化肥需用量、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二是在用药方面，了解药物成分的明确数据并据此科学指导施用。尽量控制使用污染环境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三是在灌溉方面，加强对污水灌溉的管理，严格控制城市污水、工业废水中排放的重金属、有毒有害有机物及酸碱等标准，保持农业灌溉用水的清洁度。

（二）有效落实农业生产操作规程。在施肥、用药、灌溉等环节，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例如，在施肥方面先要对土壤的养分进行测定，根据土壤养分含量和不同种类作物需求，实行配方、均衡和需求量科学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浪费，改善土壤结构，防止环境的污染，确保清洁农业生产，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

（三）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建设。农产品产地环境、水、土、气立体交叉污染是伴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的产物，是由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人类活动引起的，因此在立体污染的防控技术上，一方面要审视以往技术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进行科技创新，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方法，从而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的建设工作。首先，避开地球化学污染威胁，因为某些地域地壳化学构成异常，有害金属元素如铅、镉、汞、砷等相对集中，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其次，加强对产地“废气”、“废液”、“废渣”的治理建设，达到“三废”无害化排放标准。第三在畜禽养殖区，进行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并对产地的大气、土壤、水体定期进行检测，使环境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四）发挥农产品供应链在防治农业污染中的作用。利用现代化农业供应链中超市的作用，把源于消费者对清洁农产品的需求转化为利益动力，传递到供应体系中，强化对农产品规格、质量、等级的要求，促进农产品产地污染防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实施。同时，超市通过建立优质价格制度、市场准入规定、执行监测制度、可追溯供应体系、专业物流体系等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促进农业污染的综合防控和农产品质量的提升。现代农产品供应链还有利于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户与现代化农产品供应链的联系，从而从组织机制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和产地环境安全，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提出新思路。

（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清洁农业要重视借鉴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和体系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学习国外的先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新理念、经验和先进技术。与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体制，积极争取国际粮农机构、金融组织、国外政府的支持，吸引和利用外资做好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发达国家在农业清洁生产方面的成功经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操作规程和运行机制。

（作者：中国老科协副会长）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中庸》

母爱比海深

——回忆札记之一

刘锡庚

我已是 93 岁高龄老人了，却经常思念已去世 46 年的母亲，独坐沉思：母亲对我童年时的抚育，少年时的训导、青年时的教育，尤其因日寇侵华，我未及时向父母告别参加革命。母亲想儿成疾，冒着生死的危险，穿越敌伪据点，行程千里，像在大海捞针那样寻找儿子，以及临终的嘱托。一幕一幕的往事在我脑海里出现，就像刚刚发生，言犹在耳。伟大的母爱，在我的心中扎的最牢，埋的最深，想着想着，时而老泪流，有时哽咽哭泣！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没读过书，不识字。生育了四个儿女，我最小，家庭比较贫苦，常年是糠菜半年粮度日。我出生于 1917 年，在我五岁的那年，黄河决口，百里周围一片汪洋，生活无着。父母把我姐姐托付给奶奶照料，带领全家大小，随逃荒的人流，把我放在独轮车上，外出打工，讨饭去了，最后落脚在齐河县王字庄。父亲和大哥给人家喂牛种地，12 岁的二哥领着我讨饭，母亲给人家做针线活。在讨饭中因恶狗把二哥咬伤，母亲再不敢叫我跟二哥去乞讨，昼夜不离的守护着我，给人家做针线不要钱，条件是雇主家要管她小儿子吃顿饱饭。

洪水落退后，春节前，我们全家返乡。母亲见我体质瘦弱，担心长大了，成不了壮劳力，不会种地，就和父亲商量，送我到私塾读书，将来做个教书先生，自谋生路。随即把我送进学校，我从“三字经”、“百家姓”启蒙，把《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全部读完，名副其实的“十年寒窗”。我的老师是前清时代中举的秀才齐树林，治学严谨。私塾先生对学生优劣的评价是以对所学的东西背诵能力作标准的。如对老师提示的句字，立即接上，流利的背诵下去，那是优等生，备受赞扬；如老师对某书提示了上句，你不能立即流利地接上下句，卡了磕。老师就怒发冲冠，轻则把学生的书抛到地上，重则罚跪，如实在不能容忍时就用戒尺打手心了，轻则三五下，重则十几板。背诵书这一课，是每天早晨的必修课，不准间断。每当我蹦蹦跳跳地回了家，那是背书顺利过关了，母亲面有喜色。有一次，我因背诵“礼记”时不断卡磕，挨了老师四大板。回家吃饭时，伸手拿碗，红肿的双手被母亲看到，她立即说：“挨打了吧，活该！还有脸吃饭，滚回去。”不准我吃饭，把我赶回学校。我走后，她又心痛得叫我姐姐拿块高粱饼子送到学校，把我叫出来说：“娘不知

道，这是我偷偷给你送的。吃吧，好好念书，娘就不生气了。”我就是在母亲这种恩威兼施的抚育下养成了好学、求知的性格。

母亲很重视培养我的劳动习惯。在我下学之后，叫我和她一起推磨。把一根棍子绑在磨上，叫我抱着那根棍跟着她一起转，人矮磨高，我只好举棍齐眉。推完磨石，母亲从衣裳箱子里，找出一个干馒头给我，以示奖励。但那个馒头太干，用手掰不开，最后是用菜刀的刀背砸开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干馒头里有片绿色的丝丝，丝丝里有个红色的小蛹，母亲用簪子把那块绿丝和红蛹挖掉，用口吹了吹，交给了我，我却吃得很香。

母亲常说：“严是爱，纵是害。小孩就像棵小树，小树不修理成不了材，小孩不管教，也成不才。”有一次在睡觉前，她给我讲故事：“从前，有个小孩有偷东西的坏毛病，常偷人家瓜、果、梨、枣。把偷的东西拿回家，他娘见了不但不打他骂他，还夸他‘鬼’（精明的意思），常言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那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因偷盗犯了王法，被官家抓去，关进监狱。他娘去探监，给他的儿子喂饭时，儿子把他娘的手指咬了一块下来，恨他娘在他小的时候，为什么不管教他。”这个通俗深刻的故事，我常讲给我的儿孙听，我常教育他们忠诚办事、廉洁做人。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新思潮，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县政府明令禁读“四书”、“五经”，要更新课本，提倡新文化，同时调各村私书先生到县城培训，并派出督学人到学校查学。农村不少的学生都争着上洋学堂，去读书。民国21年（1932年），我和秀才家的儿子齐景侨、富农家的儿子刘继颜到滨县城里上了第一高等小学校。在旧社会，穷苦人家的孩子读书被歧视。有人挖苦我是“锄镰一担筒的胚子，熬不成戒尺”，也有人讽刺说我们是“小鱼跟大鱼一块穿串，早晚会串掉了腮。”我的父母听到那些讽刺挖苦的话，很心酸，很难受。我则暗下决心，努力读书，一定为爹娘争口气！在学校，我刻苦学习，从不懈怠。

1934年，我在高等小学毕业后，当年考入山东省立惠民乡村师范。我拿着录取通知书，高高兴兴地找到正在干活的父亲，父亲说：“考上了好，可咱念不起。”我说：“是师范，学校每月发五块大洋助学金，用不着花家里的钱，就是第一年报到得交五块大洋的保证金和两块大洋的学杂费，有七块钱就够了。”父亲唉了一声，说：“七块钱咱也没有哇！”母亲坚决支持我上师范，知道师范毕了业，可以当小学教员，找到了一个稳定的饭碗。父亲却为筹借那七块钱犯了难。最后，父亲说：“为了孩子，这笔高利贷累死也得背。”父母亲虽为我这笔学费感到压力，也感到他们最小儿子毕业后，能找到个饭碗而欣慰！

在师范学校，除课堂上听讲语文、数、理、化和教育概论外，也阅读一些社会主义 ABC、哲学和苏联的一些小说。一些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时事形势，思想甚是活跃。1935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引发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响应。1936 年又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要求蒋“联共抗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调停，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1937 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事件三年内一个接一个，激发了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进步学生抗争，影响到了进步的军人，也波及到全国各个阶层。阶级矛盾激化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因国民党占统治地位，惠民师范较开明校长王绪兴和他的教学班子全被撤换，新上任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到校不久，就对一些进步的学生秘密搜抄，并以“共匪”嫌疑将李景湖开除，由于我参加“读书会”，遭到新教务主任训斥。这些事情传到我的家乡，母亲知道后，非常牵挂。1937 年，我暑假回家，母亲问我：“听说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长知道后挨训了吧。听说那个蒋什么长也同意联合抗日，我看抗日救国没有错，自己不犯法就行。常言说“人犯王法，身无主，犯了王法，谁也救不了你。”1937 年秋季开学后，日寇已占领北平、天津，进攻上海的消息不断，人心惶惶，学生已不能安心上课，随时准备逃亡。11 月 11 日深夜，学校敲钟，紧急集合，校长说：“日本鬼子已从德州向惠民进犯，要立即撤退。”全体师生立即离开惠民向济南进发，从此，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爹娘。师生奔走四五天，才到达济南。校长去找省教育厅，所有省级机关早逃之夭夭。校方又率领学生抵达兖州，也毫无教育厅的信息，加之经常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校长宣布“学校解散”，要大家各自逃生。大部分学生被中央军诱惑骗走。我和李秉剑、牛斐然、孟昭义等 24 位同学先逃到徐州，再逃往开封，同难民一起在街头流浪。12 月中旬，我们在开封龙庭遇到前任校长王绪兴，经他的朋友介绍，我们 24 位同学去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把我们送往泾阳县安吴堡青年战时训练班，从此，我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8 年春节后，我被送往延安学习。同年 5 月响应党中央“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的号召，到达河北冀中平原，在抗战前线对敌斗争中，我亲自参加了“五一反扫荡”。1942 年日寇调集 5 万大军，由岡村宁次指挥，从五月一日起到六月底进行了两个月的大“扫荡”。日寇对冀中的“五一反扫荡”十分残暴，世所罕见。实行抢光、烧光、杀光“三光政策”。利用据点、碉堡、公路、沟壑，把冀中分割成一千七百多块，“纵横搜索”、“分

段清剿”、“奔袭突击”等等。我军与敌作战 272 次，虽然取得击毙日伪军 3851 人，击伤日伪军 7521 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我指战员也伤亡 4671 人，县区游击队损失 5300 余人，被杀害、捉走的干部和群众五六万人，使冀中平原出现“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的悲惨局面。

战火纷飞，无法通信。也不敢通信。失去五六年儿子的母亲，不知他的儿子在哪里，更不知道是死是活，忧郁成疾。经常到村头上去瞭望、等待。有时家人去劝说，搀扶她回家，都不肯回。偶然有一次，听一个商人说：“他曾在河北省蠡县留史镇见过一个叫刘锡庚的人，此人给大家宣讲抗日救国道理。”母亲细听该商人述说的情况，并确认是自己的儿子后，邀上我的舅舅陪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无数据点、碉堡，开始了千里寻儿历程，她奔波十多天，从山东滨县单家寺来到了河北蠡县留史镇。

1943 年 4 月 16 日，我和《团结报》社几个同志，正隐蔽在留史镇一个农民家中开会。我的母亲和舅舅也正巧来到了留史镇，遇到我的警卫员小田同志。母亲向小田打听：“小兄弟，我向你打听一下，刘锡庚住哪里？”小田愣了一下，问：“找刘锡庚干什么？你是谁？”母亲说：“我是刘锡庚的娘，这是他舅，我们是从山东来的，找儿子的。”小田问：“他长什么样？”母亲描述了一下，小田听后，立即把两位老人领到我们开会的房子，未等进门，小田就喊：“刘书记，你娘来啦！”我下意识地回了一句“胡说”。小田说：“真的”。话音未落，两位老人已经进了我们开会的房子。当我迎上前叫了声娘，并搀扶她时，母亲抓住我的双手上下打量了一回，眼里含着泪花说：“还是那个样子，就是瘦了点，娘见到你就放心了。”这时，报社的同志都上前看望和问候。母亲说：“你有这么多好伙伴，都像亲兄弟，我更放心了！”报社的同志们散去，我与母亲谈家中事，母亲说，“家里你哥哥们都还好，去年，家乡发大水，遭了灾，你爹去世了。”我听到这句话，就哭了，母亲也哭了，我舅舅看我们越哭越伤心，在一边劝说：“事情都过去了，哭有啥用，还是和孩子说点别的吧。”当天晚上，我们秘密地转移到耿家庄。夜里，我和母亲睡在一起，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母亲说：“是菩萨保佑，意外打听到的。”母亲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全过程：清明节前，你大哥到单家寺（是敌伪区政府所在地，距我村只有一华里）赶集，在一卖皮货的摊子上买东西，在谈生意中，那个商人说，唉！你的口音怎么和我们那里的外地人口音一样呀。你哥问，他叫什么名字？商人说叫刘锡庚。你哥问他长什么样？多大年龄？商人说 20 多岁，中等个儿，像个学生。你哥问他是干啥的？商人用手比了个“八”字。你哥说，别说了，别说了，晚上请你到俺家坐坐。你哥从单家寺回到家，说碰了件奇事，全家听了高兴的没法说了。晚上，你大哥把客人请到家，我和你大哥、二哥对

人家表示了千谢万谢。我先问“听你说的那个叫刘锡庚的，像是我的孩子，你在哪里见着他的？你怎么知道他叫刘锡庚？”那个商人说，我也姓刘，叫刘树棠，是河北省蠡县刘李庄人。年前一个晚上，我们二三十个同行到留史镇，在一个放皮货的仓库里开会。蠡县的一个县干部说，今天请延安来的刘锡庚队长给我们讲对敌斗争方法。接着刘锡庚讲各村青壮年要组织游击小组，要挖地道，搞地道战，还讲要坚壁清野，把粮食、衣物埋藏好，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大家听了很开窍，都说讲得好。我母亲急问那商人，能到哪里去找到刘锡庚？商人说，我跟他没有来往，他也不认识我，你们想去找，就到河北省留史镇去找，他常在那一带活动。母亲问商人，到河北留史镇多远？怎么走？商人说，可远啦，从你家到留史镇恐怕有千多里路。我从家里到山东来做买卖，就是从家到保定，在保定坐车到丰台，再从丰台转火车到山东省张店，从张店下了火车到北镇，到单家寺的。如你们去留史镇找儿子，那就顺着这条路线走：先到北镇，坐上马车到张店，从张店买火车票到丰台下车，再坐火车到保定，从保定下了火车，到我家刘李庄，也就是四十多里路。你们到刘李庄找我刘树棠住下来。从我村向南大约四十多里路就到留史镇了。我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叫刘树棠说了好几遍，等记清楚背熟去留史镇的路线了，才罢休。

母亲寻儿心切，很快就卖掉粮食，借钱筹备路费，邀上我的舅舅，过了清明节，就按着刘树棠告诉的路线上路了。同年4月15日，母亲和舅舅到达刘李庄，在刘树棠家住了一宿，4月16日，到留史镇寻找她的儿子。非常巧合找到了我。我与母亲离别了六、七年，在他乡见了面，母亲和我一直兴奋地睡不着。17日的晚上，我们又秘密地转移到高作村，九地委宣传部长郭春元闻讯后，专程去看望了我的母亲和舅舅，并向我建议对外要绝对保密，担心包围在我们附近的大百尺、曲堤、西演据点的敌伪军侦察到消息，发生不测。我把领导的意见告诉母亲和舅舅后，他们都很理解，说：“领导说的对，我们也怕出现意外，见到你就放心了，越早走越好。”于是我托一位最可靠的老战友孙光普同志去办，孙光普同志找来一位社会经验丰富的杨桂馨，他雇了一辆马车，于4月19日把我的母亲和舅舅送到保定，并帮着买了火车票，送上去山东的火车，我和所有同志才安下心来。

时年62岁的母亲和60岁的舅舅冒着很大的风险，用了十多天的时间，穿越无数的敌伪据点，行程一千多里路，一个接一个地巧合化解了出现的难题，使母子奇迹般相遇，使我感到十分幸运，更增加了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革命到底的决心。

1945年春，我从冀中调回延安，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1948年被调在中央政策研究室，1949年3月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因解放区的铁路、邮政相继恢

复，我写信给母亲说，我已来到北平，也早在延安结婚，已经有了两个男孩，等领导批准后，我就立即回家探亲。中秋节前，廖鲁言副主任批准我回家探亲，中办给了我一套新军装，我坐上火车，到了德州，然后，坐上拉货的马车，又走了三天，才到久别的家乡。见到母亲很健康，两个哥哥都儿女成群，十分高兴。母亲见到我既高兴又感到不足，责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回来，不把我的儿媳和孙子一起带来。”我向母亲解释：“你儿媳在医院工作，请不了假，孙子都小也离不开他娘，下次回家，我一定把他们都带来，母亲笑了。”母亲又很严肃地问：“你学上抽大烟（鸦片）没有？”我说：“我连旱烟都不会抽，闻到烟味就头痛。”母亲连声说“好，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在战乱、灾荒的十多年里，村中变化很大，当年的同学有的参加抗日牺牲了；有的成了国民党的骨干，被政府关在监牢里；有的英年早逝；有的贫困潦倒，骨瘦如柴。和灾后余生的几个伙伴相聚，很少有笑声，更多的是长吁短叹！我在家过了中秋节，就返回北平。当火车到达天津时，见到车站和高大的建筑物上，红旗飘扬，彩灯通明，才知道新中国诞生了。

我在北京工作的时期，1950年，母亲由我大哥陪同来到北京，主要是想看看未见过面的儿媳和两个孙子。从她每天的笑容里，感到母亲的满足和幸福。1951年，我带上老婆儿子回家探亲，更喜坏了母亲和全家乃至亲友、乡亲。当时，虽然家庭贫困物资缺乏，母亲还千方百计、尽心尽力，使孩子们吃饱吃好。从此，我和母亲每两年交叉往来，她隔年来北京住上几天，我隔年回家看看。

1957年，我调往徐州工作。1959年，母亲已近80岁的高龄，在她的长孙陪同下，去徐州看望我和全家人。那时，我已有第五个男孩，已近两岁，长得又黑又壮，奶奶最喜欢小五子那个憨样子。母亲住了五天，就要回家，谁劝谁说也不再留下，她说：“人老了就像熟透的瓜，说不定啥时候瓜熟蒂落，那会增加孩子们的麻烦，我也怕把老骨头丢失他乡。”从那以后，母亲再没有出过远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经济上是最困难的时期，物资奇缺，采取了“统购统销”政策。粮、布、肉、油、烟酒、糖、茶等一律凭票供应。我坚持每月给母亲寄上10元钱20斤粮票，保证她的基本生活。1960年春，我因孩子多，被褥少，市场上没有供应，我给母亲写信，要她给做一条被子。中秋节后，我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床被子。新里、新面、新棉絮，感到母爱比海都深。

1964年5月末，我在徐州收到二哥的电报，说：“母亲有病，速回。”我立即带上姐姐、老婆和五儿子乘火车到济南。67军一位老首长派了一部吉普车，给我带来30斤大米，送到我家中。我们进一门，看到母亲一人坐在炕上纺线。她一见我们就责问“你们怎么来了？”我说：“二哥在电报说娘生病，我们就急着来了。”娘说：“胡闹，拉几天肚子，算什么大病，丢下公事回家，还用

公家车送。”指责归指责，还是一把把五岁的孙子拉到怀里。住了两天后，母亲用商量口气和我说：“我死后，想请纸糊匠给扎套马车、童男童女在阴间侍奉我。糊个纸柜好放钱，行不？”我说：“娘，你常说人死了就死了。您怎么还信那一套，那是迷信。”母亲有些不高兴。她说：“我就猜你不赞成。”也就在同天下午，二哥把我叫到他家，批评我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写信向娘要被子，你困难，娘更困难，棉花是国家统购的，不准私卖，也不准私留。为了给你弄那床被子，娘求东邻拜西舍，跑了十来家，才凑了10斤籽棉，又自压、自弹、自纺、自织，大半年才做成那床被呀！多难呐！”我被指责的面红耳赤，十分后悔。对照母亲和我商量她要糊纸车马，我未赞成，反思母亲为儿子一床被子的要求，千辛万苦，一针一线，满足了她小儿子的要求，而我太不理解母亲心理和愿望，常言讲“孝顺、孝顺”，顺才是孝。我没有顺着母亲，满足她的愿望，我对母亲未尽到孝心。

6月底，姐姐回到徐州。我下班回家，见姐姐鞋子蒙着白布，腿上扎着白带子。便问：“娘怎么样啦？”姐姐说：“娘，6月24日去世了。”姐姐哭了，我也哭了。我说：“为什么娘去世，不告诉我？”姐姐说：“娘不准告诉你。娘走得很明白，很安详。24日那天上午，娘倚靠在炕头说，‘我估摸着不行了，快叫老二来，你们把箱子打开，把被褥、衣服和钱都找出来，我给你们分分。一家一份，把那床被子给老三。把160多元钱留下60多元，我死后，买些馒头、菜出丧，剩下的100元交你姐姐给老三带回去。’”又说：“我死了，不准糊什么车马、纸人，老三说那是迷信，干部家属这样做，叫人笑话。””说完后，闭上眼睛，一直再没睁开，也没说话，傍晚就咽气了。我边听边哭，后悔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场，没有跪在她的灵前，磕几个头，送她一程，最后孝敬她老家人，痛哭一场。这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

（作者：原农业部副部长）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中庸》

蒋匪猖狂攻延安 夫妻失散重团圆

——回忆札记二

刘锡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不久，蒋介石派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要员张治中等到延安，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一般人都认为和平有望，脸上绽放出希望的笑容。当时，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受教务主任侯维煜直接领导。因和中央组织部同在一个山头上办公，又常去中组部联系工作，我认识了中组部安子文部长，我同中央党校秘书长刘仰侨、评剧院杨绍萱教授住在一个小区，逐渐熟悉起来。加上科长马吉林、刘火和小青年颜世昌，老、中、青三代人，有的是满腹经纶，有的是幽默诙谐，有的是纯洁无瑕，十分活跃。后来，刘仰侨夫妇添了新丁“小鼠”，杨教授老年续弦，我和中央医院的护士张庆如结了婚。整个小区喜气洋洋，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然而，蒋介石表面上以谈判作掩护，背地里却调兵遣将大举进攻解放区。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后，向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的同时，也在亲自部署进攻延安。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党中央在研究击破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同时，也有步骤地疏散延安中直机关。中央党校由侯维煜主任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150余人进入清涧县袁家沟，搞土改试点。我们宣传党中央的土改政策，受到群众热烈地拥护。土改工作团在袁家沟度过1947年春节。

那时，我的妻子正身怀有孕。2月26日，她请假离团，去中央医院体检，几日未归，我心急如焚。正因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逼近延安，上级命令我们土改工作团紧急撤退。就这样，我和我的妻子张庆如失散了。在蒋匪进攻下，土改工作团先从清涧县袁家沟转移到佳县神泉堡，又从佳县东渡黄河，进驻山西省临县枣林村。我们安全了，但陕北的战事越来越紧，我妻子去中央医院体检未归，下落不明，我十分挂念。这时，土改工作团年龄最小的颜世昌同志，提议自己回陕北，去找我妻子。我说：“不行，敌情不明，太危险。”他坚持说：“我会说陕北话，地形熟悉，年纪小好掩护，没有问题。”经向侯维煜主任请示，他同意颜世昌回陕北去找。就这样，我送颜世昌同志过了黄河，心却一直放不下。隔了两天，小颜笑哈哈地回来了。原来他过了黄河，在佳县境内遇到了准备渡河的一批人马，都坐在树林子里休息，像是自己的人，便前去打听，走近一看是中组部撤退到这里的同志，大家问他过这边来干什么？小颜说，受侯主任的指示，过来找刘锡庚的爱人张庆如。一位和小颜熟悉的战士说，别去找啦，安部长已派人把她送过黄河啦。原来是在张庆如到中央医院住地时，医院早已转移，在她为难的时候，遇到中组部转移的小队，安部长见到张庆如，问她：“你怎么

还不走。”等张将把事情原委讲清后，安部长说：“敌情严重，我即派人骑马护送你过黄河。”小颜叙述完后，嘿嘿笑了起来。好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整个工作团，大家和我一样都很高兴。

可是，我的妻子还怀着孩子，即是过了黄河，在哪里落脚？孩子出生了没有？母子平安否？这时，侯主任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再继续找，你带上小颜和李振东把那匹白马牵上，沿黄河岸南下，一直找到再回来。”我们三个人作了一些简单的准备，就动身了。沿路凡经过一个村镇，就打听一番，三天以后，我们在磴口遇到了中直机关撤过黄河的中办副主任邓洁同志，向他说明我们的来意。他说：“柳林镇有所医院，你们可到那里打听一下。”并关心地说：“你们辛苦了，发给你们每人一块白洋，路上买点东西吃吧。”

我们和邓洁主任告辞后，向柳林镇方向赶路。去柳林镇的路上，坡高、路窄、陡峭，白马拐弯时常常失蹄，一次险些跌到山下。我们到达柳林镇已是黄昏时分，顾不得疲劳，即直奔医院打听有无张庆如这个人。医院负责人说：“有，4月7日刚生下一个男孩，现在已经满月了。”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人找到了，妻子顺产，还是个男孩。我们跑到她住的房间，见到了她和孩子都很健康，十分高兴。医护人员恭喜我们重团圆，又喜得贵子。大家议论着给孩子起个有意义的名字——延晋。我到商店买了一根扁担、一捆绳子，一个元宝竹篮。第三天，我们向医院领导、医护人员道谢辞行。医院的同志还送给孩子两桶美国牛乳罐头和几个鸡蛋，并特别送上一块为婴儿遮阳光的纱布，十分热情、周到。我们临走时，医生、护士、同志们依依不舍，深深体会到战地处处有真情。

一路上，妻子骑在马上，小颜牵着走在前头。后边由李振东挑着担子，担子的一头是竹篮中的婴儿，另一头是孩子的用品。我怕路上马失蹄，就扶着马鞍当“保镖”。路人见了好奇地指指点点，有的窃笑，低着头窃窃私语。我见此情景，自嘲戏谑地说：“老百姓一定在笑我们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我的妻子在马上问：“谁是猪八戒呀？”一句话引得四个人放声大笑起来。这时，白马一惊，猛地昂起头，直竖起耳朵。好险啊！要不是小颜牵得紧，人在马上会摔下来，从此，我们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五月的天，骄阳似火，热浪滚滚，我们整整走了两天，才回到临县中央土改工作团的驻地。虽很辛苦，但很幸福。整个工作团的同志都为我的家庭重团圆，又喜得贵子而高兴，并表示祝福。

（作者：原农业部副部长）

建设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之路
贺庆棠

在世界面临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愈来愈尖锐的矛盾的今天，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越来越凸显，全球面临着气候变暖的巨大压力及实现可持续发展严峻挑战。我国也同样存在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总体恶化没解决等问题。如何化解危机，走出困境，根本出路在于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绿色发展之路，就此，谈些看法，供研讨。

一、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¹¹。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要科学理解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即“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从战略高度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定位，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人与社会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党的十七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蓬勃开展，建设生态文明省、地、县、乡、镇；建设各行各业（如农业、工业等）生态文明园区，已初步形成潮流，这是十分可喜的。建设生态文明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必然和根本选择，是关系到我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深刻变革，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我们应积极参与并努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绿色发展之路，为早日实现绿色现代化而奋斗。

二、走绿色发展之路²

发展是硬道理。但一定要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谋求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潮流。

绿色发展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自然绿色发展，社会绿色发展，经济绿色发展，科技人才绿色发展等³。与绿色发展相反的发展是非绿色发展，也就是传统的发展模式，即高能耗、高物耗、重污染、低产出、不循环的发展模式，也包

¹ 张慕萍,贺庆棠,严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1-26.

² 全国干部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32.

³ 姚波.科学发展的绿色路径[N]人民日报,2012-6.

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模式。

要使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落到实处，就一定要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绿色现代化。

（一）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绿色发展。它包括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绿色轻重工业（制造业与加工业）、现代绿色服务业、绿色商贸和金融业以及绿色消费业等等。发展绿色经济，核心在于构建绿色产业体制。形成推动各行各业的绿色生产，建设绿色环境，倡导绿色生态，促进绿色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培育高端高效绿色产业集群，提高绿色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经济的绿色发展首先决定于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产量和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发展，解决农产品安全，农村生态环境等问题。发展绿色轻重工业（制造与加工业），引领产业向高端攀升，解决资源浪费、粗放低效污染问题；发展绿色服务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增加就业，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促进绿色经济科学发展，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绿色发展中，环保与经济发展一定是双盈双提高双发展的，环保是当然的优先。否则，就是过度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生态为代价的传统粗放型非绿色发展。经济的绿色发展以发展完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为标志，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产业规模化，从而形成绿色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业—生态服务业等为一体的产业和国民经济的绿色结构和体系，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生态经济基础得以实现。

（二）绿色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是自然的绿色发展；一是社会的绿色发展。自然绿色发展指的是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生活、生产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外界环境条件，是人类和一切生命的支撑体，自然和环境也是人类的资源，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资源，也是生产力、财富和绿色发展的资本，具有巨大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自然绿色的发展，首先要制止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掠夺，切实保护好大自然中的地球五大圈，即大气圈、土壤岩石圈、生物圈、水圈和冰雪圈。特别是要更加重视和保护好海洋、森林、草原和湿地等地球主要生态系统，拓展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思路，从宏观上构筑国土安全的天然屏障和经济绿色发展的保障体系。首先保护和发展好森林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大自然绿色发展的首要任务，林业要以生态建设为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建立起以森林为主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森林文化体系，充分发挥森林碳汇功能，遏制气候变暖，保护好生物多样性，逐步实现城乡大地园林化，把森林生态系统建设成富民强国的财源，社会安全与人民幸福之本。我国是海洋大国，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超过1KM²沿海岛屿有6500多个，对海洋的开发大有可为，利用巨大的海洋资源，发展蓝色海洋经济、发挥海洋碳汇作用，保持海洋

绿色发展，维持地球生态平衡，对建设生态文明有重大意义。我国草原和草地有60亿亩，它们的碳汇功能、蓄水功能、生物物种和保护功能、生态和经济功能也都是非常巨大的，保持和发展好草地、湿地，对大自然的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也是极为重要的。总之保护和发展以及恢复大自然中的各种生态系统是实现大自然绿色发展之根本，建设生态文明之必须。绿色自然，绿色森林就是绿色财富、绿色福利和绿色安全是一体的。

社会的绿色发展，包括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和和谐发展。绿色是和谐的象征。全社会要逐步实现绿色生活，推广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倡导绿色出行，保障绿色就业，使社会的方方面面健康和谐，成为和谐绿色社会，人们幸福舒适的社会。做到各种保障全社会覆盖，经济发展，环境美好，民生幸福安康。

(三)绿色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人，是人的高素质绿色发展和科技的绿色发展，也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诸多关系，确保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和谐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和意识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要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使科技绿色发展。推行科技的绿色的开发。要造就一大批绿色科技人才、绿色技术工人、绿色企业家和职业经济人队伍等高素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要大力培养生态公民，使人的心灵绿色，建设爱祖国爱人民的核心价值体系。

总之，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是建设生态文明，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紧迫任务，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必由之路。让我们不懈努力，共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我国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和谐和可持续绿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原北京林业大学校长，林学博士，教授、博导)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中庸》

村庄经济组织形式演化的历史经验

——《村庄经济组织形式创新模式研究》序

郭书田

村庄有的地方称屯，有的地方称寨。蒙语为嘎查，藏语为坎那特，维吾尔

语为开尼特。在国外，英语为 village，德语为 Das Dorf，法语为 village.m。村庄是从事农业生产人群聚居的地方，自古有之，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人类由狩猎转为饲养，由采集转为种植，产生了原始农业，就出现了村庄。这种原始的村庄一般是由同姓家族组成的，并以姓氏命名，至今仍有沿用这种称谓的村庄，延续了数千年。

村庄是与城镇相对应的两个不同的区域，村庄又早于城镇。在村庄出现手工业与农产品交换之后随即产生了集镇，也就是城市的雏形。在奴隶社会的村庄由奴隶主与农奴组成，在封建社会的村庄由地主与农民组成，产生了古代农业。中国古代农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成为东方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村庄凋敝，农业萎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依靠村庄的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农民做出了重大牺牲。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村庄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接着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四个阶段，历时近 30 年，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农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失误中，农民既是受害者，又是坚持农业生产为保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承担者，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思想路线指引下，以农村为突破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了重大转型，即由计划型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型，由自给半自给型转向商品型，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由传统农业型转向现代农业型。在此过程中，农民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大军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改变积淀极深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累了富贵的经验。

中国村庄的主体是农民，农民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群体，也是世界最大的群体。以占世界 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许。1949~2011 年，人口由 5.4 亿增加为 13.4 亿，增加 8 亿，粮食产量由 3 亿吨增加为 5 亿吨，人均产量由 200 公斤增加为 400 公斤，有力地回答了“谁能养活起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村庄是中国社会的“细胞”，村庄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传统文化的“缩

影”，传承和弘扬这种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新的光彩，是村庄一项光荣的重大任务。

中国的村庄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行政村，相当于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全国有60多万个；二是自然村，相当于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全国有400多万个，承载着2.4亿农户和8亿农民。

中国的村庄具有丰富多样的组织资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二是村民自治的社会组织；三是以合作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经济组织。还有自上而下的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妇女会、民兵连等。此外还有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自我服务与管理的组织，如计划生育委员会、治安委员会、红白理事会、敬老爱幼协会、禁赌协会、纠纷调解委员会等。

村庄的经济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三大主体之一。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干部骨干带头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村庄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完善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自治组织发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大民主作用，保证和维护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促进社会安定与和谐。经济组织发挥组织、管理、经营村庄经济（包括资源、资产、资金）的作用，促进村庄经济的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三个组织之间的干部经过民主选举可以交叉任职，但应各司其职，防止和克服以党代政、政企不分现象。

村庄经济组织由于东中西部的自然条件差异甚大，由寒温带到赤道热带，包括平原、丘陵、山区、草地、水域等，充分发挥各地自然资源优势，创造独具特色的产业和品牌，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御自然风险能力以及市场竞争能力。

村庄经济组织由于各地历史、文化、民族等人文条件差异甚大，充分发挥这种人文优势，并融入经济发展之中，形成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种功能各具特色的产业，如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科普农业等。

村庄经济组织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集体经济占主要地位，其资产包括土地与企业两大部分，为村民共同所有，其增值效益由村民共享。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名称各异，其实质应是合作经济组织，经过确权、登记、发证，给予法人资格。因为这是农业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必由之路，也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各地的实践经验证实。我国在这件事上曾走过不少的弯路。目前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庄实行社区股份合作制，村民既是社员又是股东，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既有工资性收入又有财产性收入，并能充分行使农家做主的权利，受到农民的欢迎。这是村庄经济组织的创新，也是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和产权制度的

重大改革。

村庄经济组织在对外开放中，在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引进国内外企业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资源要素，充当龙头企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紧密型利益共同体。即延长农业生产链，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由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防止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破坏生态环境和损害农民利益。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成为企业家返乡“第二次创业”，增强了村庄经济的实力。

村庄经济组织以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宗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当前特别要克服农业的面源污染使水体变质以及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现象，为从源头上确保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做出重大努力。

村庄经济组织从微观上践行中央在“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过程中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针，扭转农业副业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原则下，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此需要加强职业教育与农民的培训，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现代农民队伍。

村庄经济组织在推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负有重大责任，各地在实践中创造各具特色多种形式的新经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庄通过与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实行联合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

《村庄经济组织形式创新模式研究》是由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承担的一项重要课题，主要撰稿人杨秋生博士收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全面系统论述了村庄经济组织的演变历史和现状，并以 102 个村庄为例，分析了村庄经济组织与产业结构要素。以西王村、九间棚村、九星村、沈泉庄村四个村为典型案例，分析研究了土地利用、专业合作经济、集体经济产权改革、跨国经营等重大问题，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以浙江、上海、福建、四川、江苏的 21 个村为个案，研究总结了村庄合并的走势与跨区域村庄经济合作的经验。这是一部研究中国村庄经济组织变迁的历史背影、现状与发展趋势很有价值的著作，在此对作者表示诚挚的祝贺。书中提出村庄经济组织出现和面临的问题：村庄“集体功能”缺位，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业比较利益低与市场规律之间的矛盾，农业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化服务滞后之间的矛盾，地区分割、行业界限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之间的矛盾，中央优农政策与落实政策不力之间的矛盾，大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不畅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反映在体制上，不同程度地违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基本方针，其根源在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障碍与阻力甚大，这涉及地方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缺位”更为深层次的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贯彻执行中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可喜的是有一批经营收入超过10亿元的村庄，产业结构与村民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成为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排头兵，发挥示范作用。这些村庄的村民收入、住房以及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当地城市居民的水平。他们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外地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带动或并入一批周边的村庄发展经济，走上富裕之路。接待大批国内外游客参观旅游，展示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合作，步入跨国企业行列。繁荣而富有活力的小城镇拔地而起，改变了城市化不均衡的布局。每年向国家交纳大量税金，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台柱子。所有这一切的实践经验充分说明：发展村庄经济是拉动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重要依托，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农民的智慧 and 创造力，潜力在村庄，希望也在村庄的美好前景。鼓舞和增强建设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念。

（作者：农业部原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中庸》

灰谐论——人体系统科学新思维

孙万鹏

编者按

这是孙万鹏同志的一篇重要新作，运用灰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医学，在深刻分析现代医学和祖国中医的理论与方法的利弊的基础上，提出西医学——中医

学——第三种医学三级发展的理论，比“中西医合作”更具有新意和超前性。作者本人曾患癌症，现在很健康的奇迹般事实，证实了这种理论的强大生命力。第三种医学的兴起，必将在为人类造福中显示其魅力。

医学社会史专家波特（Portey）指出：“医学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尽管医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人们现在对医学失望和怀疑的气氛更浓。20世纪60年代乐观主义的摇旗呐喊已消失殆尽。青霉素发明产生的激动、心脏移植带来的喜悦、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的欢呼已不复存在。相反的是，人们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恐惧日益增长。‘反应停’事件的灾难（注：导致大量畸形婴儿出生），医源性疾病的增加，癌症、精神分裂症、多发性硬化、老年痴呆以及退行性疾病研究进展的缓慢，都加重了人们对现代医学的怀疑。与此同时，随着保健费用不断增高，人们不堪重负，在主要西方国家隐约出现了医学转向的前景（注：减少利用的反比定律）”⁴。波特的观点深刻又令人深思，它关乎人类的健康、幸福，“而幸福十分之九是建立在健康基础上的，健康就是一切”⁵。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现代医学与我国传统的中医医学体系进行一次刨根问底的考察。

一、现代医学严重危机的根源

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⁶。现在看来，现代医学严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其传统的哲学观不足以支撑一个广泛深入的人体系统科学的发展⁷。这是传统哲学观的悲哀。而“悲哀是知识，懂得多的人不得不深深地感叹可怕的事实”（[法]巴斯卡语）。

1、现代医学在本体论层面的哲学观

哲学本体论（Ontology），又称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探讨世界本质的学说。“本质，是鹿角再长不能当柱子的”（中国谚语）。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实体或本体，是关于本质、共相和个体事物的问题。寻求万物的本原，就是要探求那个“万物始所从来，与其终所从入者”的东西⁸。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普遍认为，研究实体或本体的哲学是高于其他一切科学的第一哲学。“它是领导社会秩序的掌舵者”⁹。在近代哲学中，[法]笛卡

⁴ Poter R. 剑桥医学史. 张大庆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12

⁵ [德]叔本华《幸福论》

⁶ Einstein A.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519

⁷ 余振苏 倪志勇著:《人体复杂系统科学探索》，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丛书，第82页，科学出版社，2012

⁸ Aristotle, 形而上学.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7

⁹ [德]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尔首先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发明了“以数学方法为模板，以直观演绎为核心的理性主义方法”¹⁰。并逐渐成了西方现代医学在本体层面所依籍的哲学观。它似西医“思考的显微镜”¹¹曾批判性地回应了笛卡尔对理性的信心。他认为，我们应该相信的不是抽象的理性和思辨，而是经验，要相信我们通过感官来学习与认知世界的能力。洛克开启了英国的经验论传统，抛弃了西方自柏拉图之前就开始的长期以来对感官的怀疑。洛克假定心灵是一块“白板”，将用一生的经验来书写。认为心灵更像一个空房间，只有来自外面的光进入才能照亮¹²。然而，“大成不能无小弊，大美不能无痴”¹³。实践表明，唯理论与纯粹经验论都有“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的局限性。两者合作和谐、协同和谐，才是正确的思维（另有论文专述）。西方现代医学在本体论层面哲学观的片面性，无疑是造成西医严重危机的不可忽视的根源。

2、现代医学产生的还原论方法论

现代医学在上述本体论基础上产生的还原方法（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具有“时见一斑”的片面性。与这一本体论自洽的认识论是：要认识系统，就必须认识系统的组成要素。忽视的是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及整体的涌现性特征。因而似持萤烛象，得首失尾。应用于人体生命现象的认识，就形成了机械构成论的生命观。看到的只是 $1+1=2$ ，而忽视 $1+1>2$ 的情况存在。笛卡儿是主要倡导者。在这种机械图像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医学，不可避免地严重低估病人在医疗康复过程中的自组织作用。外科手术就如汽车的保养——打开汽车发动机罩，将坏零件修理一下。外科手术的分解、解剖使构成论拒绝生成论的医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现在发展起来的器官移植，允许修不好的零件用好零件来替换。备件外科是机械论和还原论发展的顶点”¹⁴。“对付癌症，则是用高能粒子和高腐蚀性化学物质来消灭生命力极强的癌细胞，在抑制癌细胞发展的同时，也造成病人机体不可逆的损害”¹⁵。有点像“只讲过五关，不讲走麦城”。笔者的父、母、弟、妹一家四人，就是在现代医学治疗癌症的极短时间内活生生夭亡的。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谈癌色变”也是大可不必的。“癌基因实际上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基因。不但在人体正常细胞中广泛存在，而且在鼠、羊等动物甚至单细胞生物中也广泛存在着，主管细胞的增殖分化等重要功能”¹⁶。它是“持其志，无暴其气”的。现在一般的

¹⁰ 孙万鹏：《第3种科学》，第4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¹¹ [法]雨果，《悲惨世界》。当然，在英格兰，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¹² [英]罗伯特·索罗门（Robert Solomon）、[英]凯瑟琳·希金斯（Kathleen Higgins）著，杨艳萍译：《最简洁的哲学：智慧的历史》，第132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

¹³ [唐]《白居易集·策林·议文章》

¹⁴ Porter R. 剑桥医学史。张大庆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59

¹⁵ 余振苏、倪志勇：2012

¹⁶ 周东浩著：《中医：祛魅与返魅：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中医现代化及营卫解读》，第42页，桂林：广西

看法认为，癌症的发生其实是癌基因和抗癌基因失谐，从而使癌基因不适当表达的结果¹⁷。

那么，原癌基因变成致癌基因，是不是意味着细胞发生了癌变呢？不是的，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控下，癌变基因大部分可以被修复，只有在内外环境损害因素反复作用下，癌基因和抗癌基因严重失谐，“块胞不能障狂澜”，正常细胞才变成了肿瘤细胞。它往往要经历4~6次失谐突变，才可能发生。那么，一旦有了肿瘤细胞，是否意味着人就得了癌症呢？也不是。研究表明，从肿瘤细胞到器官癌变再到影响到整体的人，往往要经历十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作用无处不在，在其正常的协谐下，癌变细胞大部分可以被清除¹⁸。在笔者看来，不少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这就是为什么日复一日的好心情的“迭代”与坏心情的“转移”，是战胜癌症的方法之一。现代医学的还原论思维，对此往往不能理解。

3、现代医学科学基础—细胞病理学说

对于疾病的本质问题，曾有过不同的学说。与我国《黄帝内经》几乎同时代的古代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存在着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疾病就这四种体液的比例失谐；到18世纪，意大利的莫干尼(1682~1771)提出：“疾病是器官形态学的改变”；到19世纪，德国的魏尔肖(1821~1902)进一步指出：“疾病的本质在于特定细胞的损伤”，即把疾病的本质还原为细胞的病变，将一切疾病都看成是局部的，是“见一蛋而知全鸟”的。不可否认，魏尔肖细胞病理学说的建立是人类疾病认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细胞病理学说的指导下，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医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飞速发展，但是同时，由于许多重要的临床现象在细胞病理学说中得不到妥善的解释，其理论的局限性也日益突出¹⁹。明显的例子是，大多数精神疾病和为数众多的所谓功能性疾病，在细胞病理学说中找不到位置，更有许多的疾病如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被冠以病因不明的尴尬称号。使人不得不对其“本者，万病之所以生也”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假如一切疾病都是“特定细胞的损伤”，“一切疾病都是局部的”，那么，治疗的着眼点必然应该是恢复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正常。可是，它与现代医学的临床外科手术切除病变组织是“南辕北辙”的，就其结果来说是直接导致了病变细胞的死亡，而不是恢复了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完整，然而我们却认为疾病治愈了。其实，人体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不计其数的细胞衰老或者死亡，难道这是患病了吗？假如疾病的本质真的是人的细胞病的话，是否人一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¹⁷ 同上

¹⁸ 同上，44页

¹⁹周东浩著：《中医：祛魅与返魅：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中医现代化及营卫解读》，第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旦有了一个肿瘤细胞就应该诊断为肿瘤呢？那就如周东浩博士所说，那样世界上又该有多少肿瘤患者呢？²⁰。以上种种矛盾告诉我们，疾病的本质，不能还原为病变的细胞，“一个蛋，不能算一只小鸟”（中国谚语）。

有人认为，细胞病理学说的局限性是由具体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希望细胞病理学说的种种矛盾，可以在未来的基因病理研究中得到圆满的解决。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日月虽明，不照复盆之下”，它仍然未能摆脱还原论科学的局限性。正如荀子在“解蔽”中所说：“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

笔者赞成周东浩博士的观点，“决定疾病发生发展的，不仅仅是器官、组织、细胞、基因等各种要素的性能，更重要的是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²¹。最近，“全球华人遗传大会”在杭州召开，专家指出：“人是否会得疾病，并不单一由自身基因决定，还与体内的各种菌的基因相关”²²。还原论关注是基因个体，非还原论重视基因与基因的协谐关系。前者属实体范畴，后者却是关系范畴。本体还原论、认识还原论、方法还原论与还原论科学观，正是现代医学严重危机的根源。

笔者相信，灰谐论——人体系统科学新思维，将会为克服现代医学的严重危机，“撒下种子也撒下希望”。

二、灰谐论视角下的中医营卫解读

美国圣菲研究所的侯沉博士指出：“阴阳是中医的基本概念，它本身又是个哲学概念。由于阴阳本身的歧义，造成中医长期以来医哲不分，众所纷纭、玄奥难懂的困局，因此，破译阴阳的医学内涵，就成了中医诠释的首要任务”²³。

在灰谐论看来，阴阳是中医哲学的核心，营卫是中医科学的核心，阴阳与营卫是相协谐的。

1、营卫是中医科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所谓营卫，就是营养与防卫。它是我国传统中医对人体体液中营养和防御两大重要又相对独立、相互影响的功能调节系统的重要概括。可惜，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漠视。

《黄帝内经》对营卫循行有过广泛深入的探讨。在《灵枢·营卫生会》中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上焦”；“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

²⁰ 同上

²¹ 同上，42页

²² 《钱江晚报》，“科教·生命”2012.7.9

²³ 周东浩著：《中医：祛魅与返魅》序

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注于阳明，上至舌，下注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复会于手太阴矣”。认为卫气出于上焦胃上口以后，上布于肺，循经脉路线，行于脉外而与营气俱行一周后仍归于手太阴肺经，再开始新的循环。这是卫气循十二经脉次序循行的主路线，卫气主要借此流注身体上下各处。在《灵枢·胀论》中云：“卫气之在于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行有逆顺，阴阳相随”。可与以上互参。这可理解为是在生理情况下卫气的升降循行。那么，卫气的出入循行如何呢？《灵枢·卫气行》云：“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脏一一”认为早晨，人刚睡醒时，卫气出于目内眦睛明穴，行于三阳，再从足心行阴分，复合于目，昼行于阳二十五周许，夜则从足少阴肾经注于肾，按肾-心-肺-肝-脾-肾五行相克的循序循环，行于阴二十五周有奇，如此周而复始。《灵枢·邪客》中“卫气一一昼日行于阳，夜行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等经文，可与上文互参。

《黄帝内经》研究表明，卫气的升降出入是卫气运行的主要方式，而卫气的散行是补充。此在《素问·痹论》，《灵枢·邪客》，《灵枢·决气》、《灵枢·脉度论》中都有论及（此略）。

那么，营卫与中医哲学中的阴阳是什么关系呢？研究表明，从营卫来说，营属阴，卫属阳，阴阳的自然科学基础不是别的，就是营卫²⁴。

[美]圣菲研究所侯沉博士指出：对营卫的解释既符合中医原始文献的意旨，又贯通现代科学的进展。认为营卫还具有现代复杂性科学中系统、联系、降维、鲁棒等性质，应是中医科学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²⁵。笔者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

2、营卫失谐是中医病理机制的核心

中医对很多生命现象的解释，是建立在营卫学说基础之上的。将其和西医的解释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是中医抓住了更为根本性的东西。现举例说明如后：

如，关于发热。西医是用体温调定点上移学说解释的，把发热的原因归结为神经下丘脑体温调定点的改变。可是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临床上的一部分发热，而对诸如五心烦热、潮热等各种各样的发热现象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医则认为卫气属阳，受激而起，卫阳亢盛，有余则热，或卫被邪郁，运行不畅，壅聚生热，以免疫防御的状态紊乱失谐解释发热。

仔细考察现代发热理论²⁶，体温调定点的改变并不是病毒、细菌等各种感染或非感染因素直接刺激神经引起的，而是通过改变白细胞介素-1（IL-1）、前列

²⁴ 周东浩著：《中医：祛魅与返魅》，第49页

²⁵ 周东浩著：《中医：祛魅与返魅》序

²⁶ 金惠铭. 病理生理学（第4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4

腺素等各种体液免疫因子达到的。众多研究业已证实：许多免疫活因子都是内源性致热原。在发热机制中。免疫比外源性病原物等刺激神经占有更重要的主导和起始的地位。

又如，关于疼痛。中医的解释也是以营卫气血学说为基础的。自古以来就有“不通则痛”、“不荣则痛”的说法。可是西医总是把《黄帝内经》以营卫解释的内容划归到神经里面去，认为是痛觉神经的事。这是将疼痛的起始用神经的功能解释的谬误。即使是经过 Melzack 和 Wall 修改发展的闸门控制学说，也仍然有许多临床与实验事实得不到明确的解释（韩济生主编·神经科学原理[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3·710）。如果把免疫炎症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西医还原论视角下孤立的碎片，那么，在疾病疼痛机制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中，防御免疫的变化难道不比神经更根本吗？！²⁷。

再如，关于睡眠。《黄帝内经》中告诉我们，和卫气运行的失调紊乱有关。《素问·疾病类·八十三》云：“卫气昼行阳，夜行于阴，行阳则寤，行阴则寐，此其常也。若病而失常，则或留于阴，或留于阳，留则阴阳有所偏胜，有偏胜则有偏虚则寤寐亦失常矣。”然而西医却无一例外地将这些生命现象的解释归结到神经上。先是认为睡眠是大脑的休息过程，后来发现睡眠中也有脑电波活动，甚至比清醒时更频繁²⁸。

其实，《黄帝内经》关于生命和疾病现象的解释，基本上是以营卫和谐与失调为基础的，很多与西医的解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似“隔条坳，不同道；隔条江，不同腔”的，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却能非常好的与临床相符”²⁹。

3、构建营卫倾移失调模型的意义

目前，中医既有继承不足的问题，也有发展乏力的危机。既有陶醉在中医“博大精深”的“捧杀”；也有中医的经验主义不科学，甚至提出了所谓“废医存药”的“棒杀”；更有以西医、实验、实证的还原方法解释中医整体概念的“以管窥豹”。

中科院董光壁研究员，在北大“赛先生”讲坛指出：科学思想的转向不是一些科学家的个人偏好，而科学整体的自动发展趋向，是 20 世纪的科学孕育了从还原论向整体论转向，从构成论向生成论转向，从公理论向模型论的转向。

周东浩博士，根据营养代谢和防御免疫作用过程的超级复杂性，根据中国古代贤哲对营卫相互作用过程的刻画，建构了以调控人体自身抵抗能力为主要特色的理、法、方、药相协调的独特理论体系，并从西医的细胞学说“公理”，

²⁷ 周东浩：2008

²⁸ 谢启文·现代神经内分泌学[M]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403-421

²⁹ 周东浩：2008

转向了营卫倾移失谐的核心模型。笔者认为这是中医现代化新的切入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周东浩博士，以复杂系统整体论方法，研究了中医“病”和“证”的关系，研究了中医“异病同证”的原因，并揭示了“证”所依据的内在科学基础。核心模型以“证”为研究对象，选择营卫作为两个基本变量，分别以营卫强度（I）和通滞度（R）两个反映营卫偏倾失谐的状态矢量作为坐标系的两个主正交轴，并以时间（t）和空间（s）两个表征营卫推移的参数作为辅助正交轴，体现了“有重有轻，有主有辅”的灰学思维方式³⁰。

笔者赞成周东浩博士的观点，有了营卫两个基本变量，其他的变量如寒热、燥湿等，都可以从中推导出来，“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另外，时间和空间是表征系统状态推移的很重要的参数，具体取值可以依照所研究的问题而定，如中医伤寒选择六经，温病选择卫气营血、三焦这样具有特定时空复合意义的划分方法来研究外感病。

事实上，通过改变营卫通滞度和强度以及时间、空间在不同范围的取值，中医的各种“证”都可以在这个模型上得到直观的表达和再现。临床医生可以用这个“证”模型进行辩证论。有了这个模型，有助于计算机技术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以求“量大识高”；有助于将临床常用的血糖、血脂、电解质等检查反映的营养代谢的变化，血常规反映的疾病过程中白细胞等防御免疫细胞的数量变化，通过这个模型，为中医“证”的定量化表达提供“睹其前而昧其后”的方案。

当然，这个模型是非常初步的，“器满则溢，人满则丧”，笔者征求了若干专家的意见，都认为，在描述营卫倾移失谐的动力学机制中，仅有营、卫两个参量是不够的，至少还应有中医理论中第3个重要的参量“邪”，相信今后会得到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三、“西医学-中医学-第三种医学”三极发展

著名社会学家莫兰（Morin）在世纪之交时指出：现代文明呼唤对人的启蒙性认识。所谓启蒙，实在是因为关于人的知识积累并没有导致人们对生命形成的系统的认识，有关人体的科学认识表现得支离破碎。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体系统的复杂性³¹。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新的医疗知识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基石就是人体复杂系统模型的适应与创新。

1、西医呼唤新的人体复杂系统模型

目前，西医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西药的开发，“以

³⁰ 孙万鹏著：《复杂灰色巨系统论》，绪言，2009

³¹ 余振苏、倪志勇：2012

毒攻毒”，获得声望显赫的多次诺贝尔奖，它是医学进步的主要体现。但是，原本被制造用来克服某个症状的药物，同时具有其他的负面效应。“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如，用降低血压的 ACEI 能激活缓激肽，从而引发咳嗽；用来降低血脂的西立伐他汀能使心肌溶解，甚至造成死亡（Porter R .2000）。西药的大量使用，使药物病和药源性疾病不断增加，药物致畸、致癌等，已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抗生素环丙沙星在 20 世纪 80 年用于临床，曾使人们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现在纽约有 80% 的葡萄球菌对它产生了抗药性。可谓“人毁其满，神疾其邪”。

当前，城市病、富贵病、身心病、焦虑症、精神疾病等，催生了复杂疾病的概念，使以清晰逻辑思维为特色的西医难以应对。直接的后果是医疗费用急剧上升。据统计，美国在 1980~1993 年期间，医疗费用占 GDP 比例从 1.2% 上升到 14%，2008 年已上升到 17%。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比例若达到 25%，则整体社会经济将被停止、崩溃³²。反水不收，后悔何及。

近年来，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它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基因、mRNA、蛋白质等）的构成，以及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据创始人胡德（Hood）的定义）。它与以前西医过分重视要素的实体中心论不同，更强调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的联系性原理是它建构的哲学基础，但它走的是部分到整体、从下向上的认识道路。它要求我们对每一种相互作用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虽然系统生物学企图通过理论建模来弥补这一点，但依然存在难以克服的深刻困难。

应该承认，21 世纪是“系统”的世纪！系统生物学作为西医的一枝后起之秀，虽然问世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它已经在世界各地发了芽，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相信它对于克服由还原论西医造成的种种危机，会产生有益的作用。

然而，作为以新的系统生物学为基础的新西医的发展，会不会取代中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系统论西医的研究，集中在细胞、分子等较低的微观层次上，而中医偏重于宏观层次的研究。研究表明，系统的不同层次之间有着系统质的差别，不同层次之间的研究方法常常是不可通约的。中医研究整体层次的表现，是人在正常感觉范围之内可以识别的，它不要过分强求显微镜下的这些“科学”，在显微镜下，反而看不见整体表现了³³。因此，建立在系统生物学基础上新西医的发展，不可能吃掉中医。摆在西医、中医面前的路，是和谐并进，和谐发展。

2、祖国中医返魅的远大前景

³² Iglehart J K. Budgeting for change—Obama's down Payment on health care reform. *N Engl J Med*, 2009, 360 (14): 1381-1383

³³ 周东浩: 2008

应该指出，祖国中医学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思维方式和现代系统论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从发病原理上，复杂灰色巨系统论认为：生命是有机系统，人体和疾病过程是典型的耗散结构，其在内外环境的“涨-落-涨”的三极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耗散过程产生负熵以至“灰熵”，或通过子系统之间的合作和谐、协同和谐作用产生“灰谐”的自组织能力，能自动地实现减熵增序，有目的地把机体建立并维持在特定的“灰谐”有序的稳态上，一旦机体偏离有序稳态，它会通过自组织过程予以恢复。此现象就是生命系统的自稳调节。疾病就是生命系统自稳调节失谐紊乱的过程。中医学也认为，机体内环境的协谐平衡和机体与外环境的统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这种内环境与外环境的非唯一性协谐思想，与复杂灰色巨系统论的观点，是一致的，是“一只脚走不成路”的。

当然，星光璀璨了几千年的中医学，也有过祛魅的时代，西医飞速发展的严峻挑战，中医临床阵地的不断萎缩、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种种问题都令每一个关心中医发展的人心急如焚。但是，随着阴阳是中医哲学的核心，营卫是中医科学的核心，中医经络本义是营卫的循行通路，“营”对应着“血”，“卫”对应着“气”，营卫倾移失谐是中医病理机制的核心，“卫气为百病母”——“免疫的紊乱失谐是根本”，“营卫和”——代谢与免疫的协谐，整体免疫观的揭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不可逆的瓦解代表个体整体性的终止（死亡），营卫倾移失谐模型的建构等等中医科学成果的大量涌现，迎来了中医返魅的新时期。

正如，美国圣菲研究所的侯沉博士所说：从中西医的差别看，犹似韩愈的诗所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西医重器官、细胞、基因，擅长从实体出发对疾病进行分类；中医重整体，重相互作用等，各有所长。“在有些与形态改变相关的病症上，西医要强，因为西医选取的病理空间更容易描述这个疾病；而在有些和相互作用紊乱更加相关的疾病上，中医要强，因为对这些病，中医看问题的角度要好一些”³⁴。

侯沉博士指出：为什么对同一个疾病事实会有中西医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呢？实际上，这是疾病表现的复杂性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类似的例子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比如量子力学，有薛定谔传统的微分方程表述，有海森堡的矩阵方法，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描述，其实说的是一个东西。中西医的差别仿此，“只不过中西医的隔阂要深刻得多，还掺杂了语言、文化、历史等因素”³⁵而已。

3、别有洞天的“第三种医学”已浮出水面

³⁴ 周东浩：2008

³⁵ 同上

当前，西医与中医是世界上两大主流的医学体系，救人无数，也害人无数。救人无数可以理解，怎么会害人无数呢？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医学也与其他任何科学技术一样，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世界卫生组织在《1996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传染病是现今导致全球患者过早死亡的首要原因。每年在全球5200万宗死亡里有1700多万人是死于传染病，其中包括900万名儿童的死亡。全球有多至一半的人口，即28.6亿人有被地方流行病感染的危机……”。

“为什么传染病会成为全球危机呢？是因为大量抗生素的出现和使用。促使微生物抗药性增强。人类面对不能用药杀死的致病微生物越来越多”³⁶。

美国营养学权威雷·斯丹（Ray strand）博士在《致命药方——别让医生开的药害了你》一书中说：“告诉患者如何避免第三号杀手——药物副作用，却会触犯某些人。必须有个人站出来，来谈论药物导致的医学问题死亡，难道你不同意吗？”他还强调指出：“所有的药物与生俱来就有危险，药物也会致命”³⁷。“你找的医生越多，你吃的药就越多”，“你用的药越多，你发生严重药物副作用的危险性就越大”³⁸。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中国的谚语说：“凡药三分毒”，中药也不能例外。化学药品的《药祸》更是层出不穷。[澳]雷·莫尼汉，[加]阿兰·卡塞尔在合著的《药祸》一书中说：“一种治疗常见肠胃问题的药，居然导致一些患者严重便秘而死亡”，“降胆固醇药会引起肾功能衰竭”，“抗抑郁药会增中青少年自杀倾向”，“抗骨质疏松药可能导致颌骨坏死”³⁹。现在，过度医疗，给身体带来的损害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加严重。“全球500强中排名前十的大药厂的利润总额，竟然比剩下的490家公司的利润总和还要多”⁴⁰。

[美]罗伯特·门德尔松医学博士说：“我相信：如果90%以上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以上的医生、药物和医疗设备能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马上就会大大增进我们的健康”⁴¹。这大概是与以色列、哥伦比亚等国医生罢工，当地死亡率下降了35~50%，为其提供了证明有关⁴²。

笔者认为，这惊天的事实，在呼吁新的“第三种医学”体系降生。这种新体系，应该是以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使疾病“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驱除医源性、药源性疾病与“亚健康”的体系，应该是一种“治未病”的“非毒保健”与“健康生活方式祛病”。可谓是“君子防未然，不处嫌

³⁶ 潘德孚编著：《人体生命医学纲要》，第7页，东方文化出版社，2011

³⁷ 威雷·斯丹：2009

³⁸ 同上

³⁹ 雷·莫尼汉，阿兰·卡塞尔/著，尚飞等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⁴⁰ 雷·莫尼汉，阿兰·卡塞尔/著，尚飞等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⁴¹ 罗斯·霍恩著，姜学清译：《现代医疗批判》第13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

⁴² 潘德孚：《人体生病医学纲要》，第7-8页

疑问”⁴³。

笔者在 50 年前曾经从事过植物病害的“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研究与实践，有过药物防治不是最好手段，“以毒攻毒”代价太大的心得。近年来，将“植物保健与人体保健”进行了“交叉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深感“天有无情灾，人有回天力”（中国谚语）。健康的人，是第三种医学的作品。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过于理想化。但是，理想是事业之母。中国谚语说：“胸无理想，枉活一世”。

笔者认为，如果说，西医是医学领域的第一种科学—牛顿经典科学；中医是第二种科学—扎德（Zabeh）的模糊科学，有时模糊往往更为准确；那么，“预防为主，综合养生”的祛病保健，就是第三种科学——灰谐论的人体系统科学。这三种科学是可以合作协谐、互补协谐的。

笔者相信，若干年后，“西医——中医——第三种医学”三极发展的局面，终究会形成，而且定会为人类的健康、幸福作出各自的贡献！

（作者：国内外灰学创始人、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世界灰学文化联合会主席）

透视我国粮食八连丰后五大隐忧

王晓明 杨三军

粮食总产跨上 1.1 万亿斤新台阶，连续第五年稳定在 1 万亿斤以上，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2004 年以来“皇粮国税”的逐步免除，补贴力度的逐年加大，粮食播种面积的稳步增加，我国粮食打破“两年增一年减”魔咒，“八连丰”振奋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

但是农业生产仍未从根本上走出“靠天吃饭”，抗风险能力弱农业保险发育不健全，外资加速种业渗透步伐面临严峻挑战，有限的耕地资源还不断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萎缩。专家认为，八年连续丰收之后，我国粮食还有多大潜力可挖，连续增长的势头还能延续多久，供求“紧平衡”格局将何去何从，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未来的中国粮食能否自给自足，正不断牵动着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 “靠天吃饭”局面难改

“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2004 年以来，这九个字成为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的最大秘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增强，但仍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

⁴³ 曹植《君子行》

饭”局面。湖南 80% 以上水利工程建于上世纪 50~70 年代，大部分山塘蓄水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 50%；河北超 2500 万亩耕地没有灌溉设施，粮食生产仍是“望天收”，近 3000 万亩耕地没有节水工程；河南 254 处大中型灌区设施老化失修严重……

“化肥、农药等施用量过大，还导致土壤有机质的不断流失，影响了粮食后续发展能力。”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岳德荣说，东北平原耕地黑土层已由开垦初期的 80~100 厘米下降到 20~30 厘米，每年流失的黑土层厚度为 1 厘米左右，而形成这一厚度的黑土大约需要三四百年时间。他说：“如不加快治理，50 年后整个黑土区粮食产量将降低 40% 左右。”

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粮食生产效率与品质的提升。在全国产粮状元县吉林省榆树，农业局副局长孟繁野分析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特定时期可以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对农业机械化的使用和推广却有所制约。他说：“每家就一亩三分地，不管是耕地，还是收获，大型农业机械很难作业，新技术的推广也很困难。”

大力发展滴灌、喷灌等设施农业，让农民看到了希望，是粮食生产走出“靠天吃饭”的根本出路。“如今镇里有了膜下滴灌项目，种地不再依赖老天爷下雨，2011 年平均公顷产量达到 2.7 万斤，增产幅度达 80%。”张宝柱说：“种了一辈子地，从没想过玉米能拿这么高产量，全镇已经有 1300 多户农民把土地交给了项目区，连片滴灌面积超过 1500 公顷。”

种粮“比较效益”不高 青年农民加速流失

“如今种一亩地，还不如出去打工三天，村里年轻力壮的基本都出去找活了，留下种地的基本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农民。”在吉林省梅河口市海龙镇，农民周庭富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种粮的“比较效益”账：正常一公顷水田打 1.5 万斤稻子，每斤按照 1.5 元计算，毛收入 2.3 万元，去掉 2 万元的种植成本，利润只剩 3000 元左右，平均到每亩只有 300 元，而如今吉林省一个普通瓦工，每天至少也能赚 100 多元，一年到头种一亩地，还不如打工三天。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日前表示：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价格可能面临新的问题，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农业生产正在进入高成本阶段。记者在吉林、河南、河北等地采访发现，近年来粮价虽然涨了不少，但是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用工成本上升，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度增加，种粮的比较效益不升反降。

据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调查，近 5 年来全省小麦生产成本亩均增加 732.1 元，年均增幅 7.9%；亩均收益增加 193 元，年均增幅也是 7.9%，但如果刨除政策性补贴，亩均收益仅增加 60.9 元，年均增长 6.8%，低于成本增速。

记者从辽宁省农委了解到，随着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粮食价格涨幅低于生产成本涨幅，种粮亩收益一直在几百元左右徘徊。目前辽宁省粮食主产区近一多半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紧缺，留守劳动力素质下降，影响良种良法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未来粮食增产潜力的发挥。

农业保险“发育不够” 农业抗风险能力弱

“一公顷玉米，在绝收情况下能得到 3000 元赔偿，根本不足以保障农民再生产能力。”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中央堡村村书记刘义说，如今种一公顷玉米，种子、化肥、农药 3000 多元，加上秋翻地、播种、中耕、秋收等各环节费用，仅农机费用就要超过 3200 元，还有后期脱粒等人工费用，种一公顷玉米的成本至少要七八千元。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分公司总经理李强说，按照制度设计，减产的程度不同，赔偿的标准也不一样。“由于现场查勘比较困难，定损的时候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所以遇上普遍受灾的情况，只能是按照上限封顶赔付。”他说：“2009 年，公主岭市上万户农户减产超过六成以上，24 个乡镇中有 8 个乡镇受灾严重，按照 150% 封顶赔付。当年公司共收保费 3300 万元，赔偿出去 3000 万，去掉经营费用，基本无利可图，不封顶根本赔不起。”

2007 年以来，中央把农业保险列入公共财政补贴范围，农业保险从最初吉林、江苏、四川等 6 个试点省份覆盖到全国主要产粮省，参保耕地面积超过 6 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近 1/3。目前我国农业保险领域，巨灾风险防范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再保险体系也不健全。业内人士介绍说，虽然国家有政策性补贴，但保险公司毕竟是企业，要遵循市场规律操作，粮食生产一旦大面积受灾，能发挥的保障作用有限。

种业遭遇“外资合围” 粮食安全命脉堪忧

我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子市场，市场规模已达 500 多亿元。国外种子公司进军我国大田作物种业速度明显加快，挤压了国内种子企业生存空间，加紧在我国进行研发布局，对我国的种质资源和种业安全构成威胁。目前我国年进口大豆已达 3000 万吨，国家对大豆及食用油市场的调控能力也已下降到不足 40%。

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站长丁万志介绍说，近年来，以美国先锋公司“先玉 335”为代表的国外品种以迅猛的速度抢占、垄断东北玉米种子市场，对我国种业安全威胁很大。与世界种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市场集中度明显不足。全国 8700 多家种业企业总体看“多、小、散”，有一定规模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超过 100 家，整体实力十分薄弱。他说：“世界前 10 强的种子企业在世界种

子贸易额中所占份额达到 35%，而我国前 10 强种业企业同期只占全球种子市场销售额的 0.8%。”

“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种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差距。”吉林省副省长王守臣说，当前种业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跨国种业的强势进入，本土种业基本上处于“技不如人、边打边退”的劣势地位。吉林省现有各类种子经营业户多达 5000 多个，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以上的只有 12 个，真正具有“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比重很小，领军企业和拔尖人才更是寥寥无几。玉米种子，本省的自育品种占有率不到 30%，国外的已超过 40%，高端蔬菜、葵花、花卉等种子大都被国外品种所占领。

美国杜邦先锋、孟山都、瑞士先正达三大种业巨头控制着全球 65% 的玉米种子市场和 50% 以上的大豆种子市场。以先锋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种业，仅用 4 年就占据了吉林省玉米种子市场较大份额，自育品种的主导地位逐步动摇。王守臣说：“一些中小企业纷纷放弃育种研发，转而为外资代理，或采用‘套牌’经营，生产面积逐年萎缩。”

工业化、城镇化 “圈地热” 紧逼 18 亿亩红线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带来了新的活力，加上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全国各地迎来新的建设高潮，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圈地热”，全国耕地因建设占用大幅度减少，土地沙化也越来越严重。

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局长崔岩说“由于地方发展上的冲动和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大量占用耕地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据统计，2010 年我国耕地面积下降到 18026 亿亩，比 1997 年的 19.49 亿亩减少了 1.23 亿亩，保护耕地压力不断增大。据他介绍，从 1999 年到 2005 年的 7 年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 100 多万件，涉及土地面积 500 多万亩，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 60% 左右，多的甚至超过 90%。

“一方面是耕地大量减少，另一方面我国土地沙化也越来越严重。”崔岩说，目前我国每年有 3000 多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相当于一个县的土地面积。我国虽然实行了占补平衡，但是补充的耕地在质量上同占用的耕地有很大差距。据统计，建设占用的耕地有 2/3 有灌溉设施，补充的耕地只有 1/3 有灌溉设施。高产田、郊区菜田大面积减少，目前我国每年净进口粮食 2000 万吨左右，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将造成 5000 万人口的粮食短缺。

记者在东北地区采访发现，伴随城市的大规模扩张，相关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脱节严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受到严重挑战。

面对“十二五”期间东北各地的发展热情，大批重点项目纷纷上马与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的刚性约束，已经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在东北各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合法合规用地，成为下一步亟待关注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专家认为，经济发展一定要合理规划，工业化、城镇化需要推进，更要守住耕地18亿亩的红线，守住我国农业生产立身之本，农业稳才能天下安。

（原载《经济参考报》，《苏州农村通讯》转载时有删节）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

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

——《中庸》

《农业与工业化》：农机化理论宝库

——“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博士论文初识

张蓝水

我国农机化领域早就有一种说法：农机化没有理论。如今，随着一位经济学大师离我们远去，有必要发掘这位大师1945年博士论文所揭示的惊人深刻的农机化理论。这就是张培刚和他的《农业与工业化》。

2011年11月23日，我国失去了“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中划过的那一道炫目的亮光”（张培刚的学生、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初语）的经济学家——张培刚，世界失去了“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我国农机界失去了未曾相识的现代农机化理论的奠基人。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张培刚（1913.07.10~2011.11.23）在1941~1945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博士生导师、“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布莱克（John D. Black）。他的英文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完稿于1945年10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2月受聘中国资源委员会纽约办事处专门委员，研究中国农业机械化问题。

1947年4月，其博士论文获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

奖和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威尔士奖”奖金。“大卫·威尔士奖”是该校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张培刚是获奖者中第一位亚洲人。与他同时获奖的是197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现代经济学权威——保罗·A·萨缪尔森。1951年前，张培刚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学领域最璀璨的一颗星。

1949年，《农业与工业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出版，是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被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盛赞为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

《农业与工业化》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在南美洲引起巨大轰动。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到北京求见张培刚，他才知自己的博士论文出了西班牙文版本。1969年，英文本在美国再版。1984年，这部蜚声国际的经济学著作才有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此书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阿德曼教授说：“这本书应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最早作品。”1982年世界银行专家霍利斯·钱纳里来华，在上海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培刚·张。”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国际名望甚高，国际学术界认之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但国内知之者却甚少。一代经济学大师、张的导师陈岱孙教授1993年说：“它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新兴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这是一部能够撬动世界的书。

农业机械化：“发展经济学”重要篇章

农业机械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中连接城乡的枢纽，横跨农业与工业的桥梁，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农业机械化问题往往是其中心议题。因为，狭义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问题。张培刚认为：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在实行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也必须实行农村工业化。走在农村工业化前面的，就是农业如何尽快实现机械化的问题。

张培刚在他的这部“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中，著有关于农业机械化的独立章节。第四章“工业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的核心部分是第三节“农业机械化”，分为“机械化的方式”“机械化的条件”“机械化对于生产的影响”三部分。第五章“工业化对于农场劳动的影响”的核心部分是第三节“劳动力从农场到工厂的转移”，分为“关于行业间及区域间劳动力转移的学说”“机器

代替农场劳动力” “工业对于农场劳动力的吸引和吸收”三部分。这些只是直接论述农机化问题的章节，而间接的涉及农机化的论述则贯穿全书。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这位世界级的著名经济学家，在我国社会经济学界的知名度却不高。我国农业经济学家郭书田说，一所经济管理学院千人师生中，有 2 人知道张培刚。笔者问一位农业经济硕士研究生，说不知张培刚。我国农机界知道张培刚的人就更少。在大学农业机械化专业教科书里，见不到张培刚的影子。难怪从事农业机械化的人，常常苦于缺乏理论指导，说出“农机化没有理论”这样的话，认为农机化只是一项事务性的应用技术而已。面对张培刚 1945 年《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只能说这是我们无知的悲哀。当然，责任可能不在我们自己。我国农机化工作者有必要认真阅读、仔细研究、深刻领会这部著作，补上过去的理论缺陷。不然，该是多么大的遗憾啊！本人 2007 年在北京购得此书，真是相见恨晚。现就当前农机化领域关注的一些问题，择其要者作简单介绍，与同仁共享。

包括城市农村的全面工业化

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导论”中开宗明义“本书是理论的探讨，同时也是经验的和历史的研究。它的目的是分析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问题。” 农业机械化是国家工业化的产物。论文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根本观点是：农业国要经济起飞“必须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行工业化。”这里所说的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说这是一部有关农业机械化理论的著作，实不为过。1934 年张培刚在一篇论文中就提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这就克服了把“工业化”理解为单纯发展制造业，而不顾农业的观点和做法的片面性。国家工业化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农业工业化的提法应该说包括了农业机械化和对农业实行工业方式的经营与管理。

“随着工业化进展到较高阶段，农业生产的绝对数量虽然将继续增加，其经营规模亦将有所扩大，但其农业生产总值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必然将逐渐降低；同样，其农业劳动者人数，亦可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或其他方面的转移，而在绝对数量上有所减少，在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上也有所降低。”我国正在经历着书中所指的这个过程。张培刚还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达到“工业化”的标准：“只有当工业化进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原来的 2/3 甚至 3/4 以上，降低到 1/3 甚至 1/4 以下；同时农业劳动者总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也由原来的 2/3 甚至 3/4 以上，降低到 1/3 甚至 1/4 以下，这个国家才算实现了工业化”。由此观之，我国与“工

业化国家”距离尚远。

工业发展与农业改进

在第四章“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中，张培刚首先谈到“工业发展与农业改良”的关系。文中所说的改良、改革、改进，实际上都是指的农业技术进步，可能用“技术改进”较易于理解。

张培刚说：“工业发展乃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我们将‘改革’（Refoem）一词当做机械化和大规模组织来解释，更为如此。”这就很容易理解，“农业技术改革”为什么常常指的就是“农业机械化”。虽然“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改进是相互影响的”，张培刚说“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假若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来供给必要的工具，农业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他的结论是：“就长期而言，农业的进步必然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农业机械化显然是国家工业化的产物。

众所周知，大规模农场的形成，从组织结构上说，是农场的合并，即独立农户的减少。或者是独立农户土地的流转，即经营面积的减少。张培刚认为，仅仅如此“并不能就足以保证大规模农场的实现。除此而外，还必须依靠一种更加重要而富于引发性的东西，才能完成大规模的农场，这就是生产技术。”他指出，“在所有的生产技术中，动力机和化学肥料的运用最为重要。”用现在语言就是拖拉机和化肥，它们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张培刚得出结论：“要使现代的农业得以继续运行，归根到底就必须依赖工业的各个部门提供机器、肥料、动力、储藏设备及运输工具。”

张培刚认为：“工业化就一种意思来说，乃是一种‘资本化的’过程”。“农业方面的‘资本化的’主要特征，举例来说，就表现在农场操作的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的利用上；换言之，农业资本化就是变更生产三要素的组合，提高资本相对于土地和劳动的比例。”这是农业工业化的实质所在。

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条件

“机械化的条件”是对农业使用机器的经济、技术、社会条件的综合分析。

张培刚分析，农业“机器采用的数量，既要看机器的物质效能，同时也要看它与农产品的价格以及与劳动力在价格上高低的比较。农产品、劳动力和机器的价格若发生变化，机器应用的程度也会相应变化。一般说来，机器应用程度的变化，与农产品价格、劳动力价格的变化，是同一方向的；而与机器本身价格的变化，则是相反方向的。”“机器的采用，部分地是由机器与劳动力的竞争价格来决定。”“役畜的价格及畜养成本也是与机器的价格相竞争的。”除这4个经济因素以外，还必须具备某些技术的和社会的条件。他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农场面积的大小。农场面积必须大到足以使机器的采用有经济上的

利益。因此，无论就理论或就历史而言，农场的合并调整实为农业机械化的一个前提条件。”这里所指的农场，主要是指足够大的适宜机器作业的面积。我国现在大型农机的跨区作业突破了农户（小“农场”）经营面积的界限，说明农机作业所必需的土地规模，并不一定与土地所有制相关。

张培刚在针对美国 1910~1940 年农产品、劳动力与机器三者做了详细分析以后，得出结论：“要具备两个最重要的必要条件，才可以将机器引入农业，那就是：农产品的价格保持较高，劳动力要稀少而昂贵。”这何尝不是向农民推广某种农业机器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在提出这个重要原则之后，他为自己国家把脉：“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只有待到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达到充分程度以后，这些条件才能产生。只有那时，由于‘收入影响’，对农产品的需要才能增加，其价格也才能升高；而由于劳动力转入工业并为工业所吸收，农业方面的劳动力才能相对地变得昂贵一些。”我国现在已经出现“农产品价高”和“劳动力昂贵”的趋势，所以农业机械化逐渐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张培刚说：“当工业化进行到比较高的阶段，农业的改进与农业的机械化过程就会相应发生”。就是说，工业化尚低的时候，农业则难于机械化。按胡鞍钢所说，“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也许“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决策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拼搏那么多年。

机械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关于“机械化对于生产的影响”，张培刚分析了对劳动力、役畜、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农场面积与数目等方面。“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要素，也是农村人口中深受机械化影响的一个阶层。”农业机械化“提高了每亩的生产力（土地产出率）和每个‘人工小时’的生产力（劳动生产率）。”他说：“在农业中，节省劳动的设备和方法究竟能应用到什么程度，农场面积的大小显然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对于农场的发展，他指出：“这些新技术一经采用，就有促使原来的农场更加扩大的力量。假若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利用，则农场平均面积的增大，就只有用减少个别农场的数目，换言之，就是用合并调整的方法。”美国近年农场数目加速减少。我国在土地流转的前提下，规模化农场有所增加，对农业机器的需求旺盛。农场面积的大小对机械化显然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随着机器能力和质量的提升，农场规模加大、农场数量减少，这是机械化条件下农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业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是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张培刚论述，农业机械化替代农业劳动力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

因。但是“城市里的工业及其他行业的吸引力”有更大的力量。一种是“预期有较高收入和较好生活”，而被“拉”入城市；一种是“机器代替劳动力”形成的“失业”，而被“推”入城市。

张培刚还分析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各种情景。乡村工业劳动者“有先行转移的就会”；青年移入城市，老年人留在农村；有的想方设法留在城市，有的则如季节式的候鸟；当萧条来到身边，又必须回到农村；“要在城市里定居下来……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阶段。”看来，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有着普遍的规律。我国城乡当前形势，酷似书中描绘的情景。这一切都是源于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农业机械化助力人类百年光辉

张培刚指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节省劳动力最多的还是由于机械化，而机械化只有在工业化的总过程中才能完成。”这使我们想到，在20世纪与21世纪转换期间，美国工程技术专家评价百年来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20项重大工程技术时，农业机械化位列第七项。农业机械化的高生产率，既从农业中解放出大量劳动力，又保证了农业满足人类不断发展的需求，因而为人类开辟社会所需的各个领域提供了可能，创造出20世纪光辉灿烂的人类社会百年。想起此时此刻，农机化工作者油然而生对自己职业的无限感慨、骄傲和自豪。

读书使人明智。学习《农业与工业化》可以提高人们对农机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张培刚1945年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应该成为我国农业机械化高等教育的理论教科书和农机化工作者必备的理论参考书。

我国正在经历“农业国工业化”的伟大历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指导这个伟大历程的各级决策者阅读这部书，也许可以使半路途中的我们，今后会少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

（作者：《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投稿或需《通讯》电子版请联系：

邮 箱：houqingxiang@126.com

电 话：13521066162

联系人：侯清香

Q Q：1739825421（草根村姑）

地 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委员会 邮编 100732

联系人：

陈婴婴 电话：13691147952 电子信箱：yychenai@yahoo.com

侯清香 电话：13521066162 电子信箱：houqingxiang@126.com

Q Q: 1739825421